

【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】

论语 正裁

与南怀瑾商榷

董子竹◎著

中国文化原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？且听董子竹的高见。
贾平凹隆重推荐！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估！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【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】

董子竹◎著

论语 正裁

——
与南怀瑾商榷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迎接人类第二个“文艺复兴”时代的到来

——兼论儒学的现代命运

一

说来也奇，几尊雕塑，几幅画，几部戏，竟然改变了人类五百年的命运。

“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！理智是多么崇高！才能是多么无穷！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爽朗而又优雅！行为多么像天使！悟性多么像神！世界之精英！万物之灵长！”莎士比亚对着无涯的天穹如此感叹着。

五百年前的这一声呐喊，使人回到了人，不再只是神敝的弃儿与奴仆了。于是乎，蒸汽推动着铁牛在欧罗巴的大地上咆哮，燃油鼓起铁鸟的双翅拍打着天堂的屋檐，玻璃套叠玻璃的“眼”要把上帝的心脏看穿。电话、电影、电视、电脑……地球成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落了。

人，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世界的巨灵神。

二

这是加拿大最北端的一座木屋，鼓声咚咚，油灯闪闪，披头散发的人们在狂舞着、呐喊着，五大三粗的汉子们，手持铁叉、木棒，向被他们围住的一头“熊”攻击着，人们在攻击“熊”的同时，嘴里都在喃喃念着咒语，祈祷着“熊神”的到来。

被围困的“熊”倒下了，这时人们才发现，他原来是一个披着熊皮的人，他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，一动也懒得动，他累极了。于是，另一个小伙子立即接下那人手中的熊皮，披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接着装扮成“熊”，与众人“搏杀”，那个累倒的人，则被拉到了一边。

据说这种舞蹈要持续几天几夜，一直要到人们认为熊神已经答应了人们猎熊的祈求为止。当地人认为，猎熊之前如果不先娱好熊神，不仅打不到熊，而



且还会被其他的神灵所责怪。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，他们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“神”的领域。树有树神、水有水神、冰有冰神、兽有兽神……没有神就没有人，人只是神的子孙、奴隶、臣民……

三

俄狄浦斯王有罪吗？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奸淫了自己的母亲……他是该死的，但他舍不得死，他挖掉了自己的双眼，以示对自己的惩罚。

俄狄浦斯王有罪吗？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奸淫了自己的母亲……但他是无罪的，因为在他诞生的那一天，一位智者早说出了他这一生的命运，就该是杀父、淫母，以至自残。他的父母早知道他的命运，如是抛弃了他，希望因此而改变“命”，结果却仍是如智者判定的那样，他的一生仍是杀父、淫母、自残……

古希腊人是伟大的，早在他们的时代，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艺术，表达了对神的怀疑、恐惧和不满，以至于希望向“神”抗争，向“命运”抗争。

莎士比亚以后的欧洲人，正是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这种文化传统，开始了长达五百年的与“神”与“命运”抗争的历史。

人们将这称之为“文艺复兴”，实质上是人性的复兴。

但是，当人类感到自己已经如同“巨灵神”一样站立在地球上的时候，人类又恐惧了，又质疑了，原来地球莫过只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，站在灰尘上的“巨灵神”又是什么？更可怕的是这“巨灵神”是短命的，一世的繁华、豪放，也莫过是那几十年。几十年的光景，说起来很长，但真正过起日子来，恰是如白驹过隙一般瞬生瞬灭。“死生无常”，人类感叹着，但仍然在抗争着。于是，环保问题，医疗问题，保健问题……最后人们终于集中到了一个课题上：“生命是什么？”

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发现，“生命”已经成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大课题。

四

从《旧约全书——创世纪》看，西方人对“人”的思考，始终没有区分开两个最基本的概念：“生命”与“生物”。在西方人那里，生命就是生物，生物就是生命。

“上帝说：‘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。’”《旧约全



书》中这段话是明显站不住脚的，如果上帝真的是按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，那人就应该可以目睹上帝，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人见过上帝的踪影。据说在海湾战争期间，打伊拉克的美国士兵曾在中东的大沙漠上见过耶稣基督显相，那是和画上一样的基督，且大了几万倍，并光芒四射。我怀疑那是不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般的幻影。任何人也无法证实上帝的真实存在，但人们又相信，上帝是每日每时都在关照着人类。这便奇了，上帝不是按他自己的模样造了我们吗？为什么他可以见我们，而我们不能见他呢？

说是上帝造了人，可以解决一个大难题：人为什么会这么聪明？答：因为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了。这么说来，上帝就是生命，神就是生命，这种说法和原始的加拿大人认为一切有神，一切是神的安排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后期的古希腊人躲开了这个尴尬。

柏拉图认为：人，是衡量一切的尺度，是衡量一切存在价值的尺度，也是衡量现在所没有的一切不存在的理由的尺度。

但是，就是这位柏拉图，又说了这样的话：“人……是一种温驯的有教养的动物。”

柏拉图的后人亚里士多德说得更露骨：“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。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。”

在古希腊人眼中，人与动物只是“量”上的区别。

亚里士多德从人的生物性肯定了“人”，但这是无论他自己，还是他人，都无法接受他的定义，于是他又说：“神的整个生活是幸福的，就人的活动同神的活动有某种相似而言，人的整个生活也是幸福的，别的一切动物中没有一种是幸福的，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分享沉思的能力。”

“沉思的能力”又是神性的了。神性又成了生命的根本，生命与生物仍然无法在概念上统一。

西方文化在一个怪圈之中。

人类不是在概念中活着的，人是活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的。既然古希腊人终于在人的神性上打开了一个缺口，人便勉为其难地为自己的动物性活着。于是，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，“享受”成了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。

到了二十一世纪，“享受”作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的时代即将结束了！

这对于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人来讲，是不好理解的，但对于今日的中国富人来讲，未必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心理体验：“享受”好无聊。

人，本来不只是动物，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物特性，最佳的结局，必然是“享受好无聊”。



人呀人！好难。

强调了人的生命性，生命又是个抓不着摸不见的东西，只好归结为“神”，在寻找不到“神”的日子里，人类为了找到“神”，几乎牺牲了全部理性。

强调了人的生物性，生物就有生物的追求、需求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，夺土地，夺能源，抢权利、抢金钱……文明的，在市场上、在桌面上夺、抢、争；不文明的，在黑道上、在战场上夺、抢、争……

争到了什么？“享受好无聊！”

但是，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人类还是要为自己的生物性需求争下去，抢下去，夺下去……“享受”虽然无聊，终是比贫困好，“享受”还是要发展下去的。

五

世界真奇妙，在两千五百年前，东西方文化，几乎是同时向原始图腾文化挑战的。古希腊文化是向原始图腾挑战的文化，中国文化也是向图腾文化挑战的文化。当俄狄浦斯王诅咒命运之神万恶无比之时，周文王提出“惟德是馨”的口号。当亚里士多德大讲人的生物性时，中国的孔丘提出了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原则。

原始图腾文化的根本，是以人对生命的一种特殊观念为基础的。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生命并不是人的生物性，而是神性，而神性又不是属于人的，“神”充满了所有地方，“神”无处不在处处在，人只是神的子孙、臣民、奴仆。古希腊以人的欲望、人创造的文明来对抗这种无处不在的“神性”，中国人则是强调人的道德就是真正的“神性”。

尧曰：咨，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，舜亦以命禹。（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）

那个时代，中国人所重的事物，在次序上是这样排列的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

对照一下婆罗门文化和上引加拿大原始文化，其次第显然是颠倒过来了。在原始宗教图腾文化中，“祭”肯定是第一位，“食”、“民”肯定是无足轻重的。

这个颠倒是不得了的。这标志着人类从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向以人（生物性）为中心的生命观进发了。



第一位的是“民”，而不是“神”，也就是说生命的本质，不是外在的“神”，而是人自身这个肉体。

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，东西方同时开始了这个转变。

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质的文化，两个完全隔绝的地域，两个完全没有交流的文化，会在同一个时代，开始了这种生命观的转变呢？

这是值得一切人认真思考的大课题。多年来，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，大半多是强调其差异性，对其雷同性思考甚少。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我们是不是多从东西方文化的一体性上思考一下呢？

依我的拙见，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反而不值得多提，反而是其互补性、同一性，应该成为人们主要思考的内容。

六

就在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人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，开始了自己艰苦卓绝且漫长的“生命观”转变之时，在地球另一个角落，也产生了一位文化巨人，他叫释迦牟尼，他几乎是从全新的角度，开始了对“人”的思考。

佛学博大精深，在这里我们只能就释迦关于“人”的思考的最粗浅的内容加以介绍。

《楞严经》是佛学入门著作，释迦从人的最切实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东西，即人的“感知”入手。

凡感知必有“心”。在东方文化的古典原著中，“心”是人的知、情、意及全部精神活动的统称。正因为如此，释迦对“人”的思考，是从“七次征心”入手的。所谓“七次征心”，就是从人的感知活动的各个侧面寻找“心”，“心”在哪儿？“心”是什么？“心”的作用是什么？“七次征心”逻辑之缜密，推理之精到，是古希腊乃至古希腊之后，西方人关于“人”的思考，根本无法企及的。一切热衷于思考人的朋友，热衷于东方文化的朋友，最好能系统地详尽地阅读一下《楞严经》这部伟大的东方文化名著。

如果用现代人的语言来介绍释迦关于“心”的观点，大致可以这样讲，“心”本无心，也有心，它是全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能量的总和。

“心”本身无所谓有无所谓无，但它绝对是“在”，就其整体说其本来无生无灭，无垢无净，无增无减。“心”的这个“在”，是与万物众生——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的“在”相一致的。有万物众生就有它，没有万物众生也找不见它。所以我们用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这个现代概念来表述它。

“心”本身无所谓动也无所谓不动，但在本质上它是如如不动的。“心”



的“动”，是与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、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无常之动相一致的。万物众生动，它便动，万物众生不动，它也不动。其实这也只是镜面上的假相，就其本来的真相说，它是绝对不动的。正因为它不动，才映衬出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。最好把它理解为永恒的镜子，镜面映照万物众生之动，而镜子本身是绝对不动的。

“心”本身无所谓个体也无所谓整体。谁也不知它有多大，谁也不知它有多小，它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。但是，它必须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样一来，任何个体的意识、感知都只能是“实相”——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总体运动的扭曲的折光反映，凡被“反映”就是假相。人类的“明德”最重要的特点在于，可以透过这些无穷无尽无边的假相，识得“真相”。譬如眼睛，眼可以见万物，但绝对见不了“自己”，凡有所见皆非“自己”，但是正因为我能见万物，所以虽我不见我，但我知我“在”！

东方文化，不管是佛、道两家也好，儒家也好，对于“人”的体认都达到了这个水平。从中国与印度的古文献看，东方文化三大家学说产生以前，大量的东方贤者，大半都接近于这个观念。比如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中，尧对舜的指示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

这里的“中”，准确地说应是“允执其中”四个字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“心”，或者说是在动态把握中的“心”，它已经包揽了一切。也如老子所说“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”。天地的启始与终了是找不到的，有了“允执其中”的“心”，万物就有了“名”，也等于有了生他们的母亲。反过来说，“四海”、“天禄”——天地宇宙不就在“允执其中”的过程中吗？不全在“心”的运动过程中吗？舍了这“允执其中”的心，还有什么可说？当然是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

儒家学说中的《大学》讲得更明白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

“明德”正是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赋予人的意识力，感知力，“明”了这个“明德”，就是“大学之道”。这道，一头是“亲民”，一头是“至善”，允执其中的便是“心”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东方文化三大家在对待“人”——“我”的问题时，几乎一致强调“勿我”、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、“吾之有患者，在吾有身”。

活着，就是“允执其中”，也是“允执厥中”，你想“允执其中”，也是“允执其中”；你不想“允执其中”，也是“允执其中”。最好是明明白白“允执其中”，你的痛苦就没有了。人类的一切的痛苦，就是只知“我”的存在，而



不知“我”的存在要依附“宇宙——生命”大系统的存在，而你对大系统，永远是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，但能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全知全能，也就是全知全能。

七

非常可惜，东方文化三大家学说产生得太早，当时的古印度除了婆罗门的宗教文化，还没有其他文化。当时的中国，尤其是周以后的中国，虽然已经从淫祀泛滥中走了出来，巫、鬼、神已经不再是文化的统治者，祖宗崇拜在这个农耕文明的村社文化国家已经占了统治地位，“惟德是馨”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，但是要承受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，却又是万难万难的。为此，释迦不得不给自己的学说包上了一层厚厚的宗教文化外衣，道家则不得不孤芳自赏清净无为，儒家在孔子时代，为了体现自己的思想，历经了数不清的卓绝努力，但孔子一退世，便儒分八家了。

“种子”是留下了，但天时地利不足以使之蓬勃生长，只好在地下慢慢拱芽。早发芽的种子呈现为“扭曲”、“怪异”，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。

儒分八家，佛分教派，道家蜕为道教，这是人们熟知的中国三家学说的命运。

在长夜中呆的时间太久、太久，蓦然见到中天丽日，怎能不眼花缭乱、泪水洒流呢？

东方文化的后人是如何扭曲自己的文化的？这个问题，我在第一本与南怀瑾商榷的书作中已经作了清楚的交待，基本特点是“三神化”，神学目的化、神圣道德化、神秘功能化。这里不再重复。

八

“明德”是客观存在，勉强地说，它是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一切能量的总和，它不会因为人类意识对它的扭曲就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。

“明德”就其本来说，无生无灭、无垢无净、无增无减，但对于人类的意识来说，它还是有一个不断扩大占领宇宙的问题。人类文化的发展史，就是人类“明德”不断扩大占领宇宙的历史。如果可以分成阶段的话，迄今为止的人类大致上是经历了两种“生命观”时代，一种是“神本生命观”，一种“人本生命观”。从二十一世纪开始，人类将进入一种与前二者完全不同的生命观时



代，这种“生命观”的表现形态是什么样子的，该如何命名，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做的事、可以完全预见的事，我们只是提醒人们，一种新的“生命观”已经到来了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它总是要来的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它的脚步。

九

人类的生命观念在从“神本”到“人本”的过程中，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分野。但是如果从其本质看，二者的差异并不是十分巨大，从一定的程度上说，基本上应是互补的。

就现在掌握的材料看，东方人走出“神本”生命观的时代，可能比西方人要早一点，大概可以推至尧、舜、禹时代，前文介绍了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的篇章，这里面的文字应是出自《尚书》的。《尚书》的可靠性是历来被人怀疑的，我们不去考究它，但“尧曰”一段文字比《论语》古老得多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从“尧曰”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，“天之历数在尔躬”，“神”的精神已经全归于“尔躬”的“人”了。

古希腊文化中“人本”的成分更加浓郁，前文所引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就是一个证明。

应该说，东西文化从“神本”生命观走出，向“人本”生命观进发，从时间上讲相差不会太大。

“明德”本来普照一切生命个体，它决不会去分什么东方西方。相同相通是绝对，相差相异只是相对的。

十

一提到中国人进入“人本”生命观，不能不首先提到孔老先生。中国文化虽然号称三大家学说并存，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儒家文化。

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，公认得令人甚至具体说不出孔子对中国作出了什么贡献。

我以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，起码有这样四条：

第一，正是由于有了孔子，中国文化自走出以鬼神为中心的“生命观”之后，没有形成一个一神尊崇的宗教。直到如今，中国人也没有宗教传统。佛教之为教，道教之为教，在其上层，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流派；在下层，不过是重



复了多神崇拜的遗迹，是弱者心目中的崇拜偶像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，一直是政治的附庸，文化的附庸，任何一个宗教在中国也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。就像元、清两朝统治者那样愚昧、落后，也没有宣布什么宗教是国教，西方那种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过。

第二，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了一两千年，但一直没有形成铁板一块的封建等级。自孔子之后，改朝换代不断，流浪子、地痞、异族酋长都有机会爬上权力的顶峰，反过来说，贵族豪门也会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。在两千年的中国史上，没有哪一家贵族是长盛不衰的，今日的贵族，明日的囚徒；今日的豪门，明日的乞丐，应是司空见惯的事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，任何一个有志气的男儿，都可以想象自己某一日捧印封侯。从汉魏的举荐制到唐宋元明清的科举制，为下层士民走出自己的阶层，留出了一条广阔的上行通道。正是这种上下可自由流通的社会结构，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。

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很复杂，但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因。

第三，民本意识深入人心。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意识起自孔孟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这种意识不但被士阶层所重视，历代帝王也无比尊崇。唐太宗的《贞观政要》几乎通篇贯穿着这种民本意识。直到近现当代，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要人物，仍然有浓厚的民本意识，虽然他们大半都是否定儒家不承认儒家的，但他们的实际行动正是“大儒家”。

第四，孔子思想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一个庞大的“士”阶层。“儒”的实际含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，但我们认定他为“士”阶层，大致错不到哪里。一般说来，他们不是统治者，却为统治者服务；不是被统治者，却能为被统治者请命。在中国，儒士应是介乎于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磨合阶层。类似这样的阶层，世界各国大半都有，但他们与中国儒士的差异非常大，即便是日本的“士”，也和我们的大不相同。中国的儒士大半都继承了孔孟的人格精神，以“敬天保民”为其人格主旨。一句话，他们大半认为自己只对“天道”负责，面对“天道”实现自我，面对“天道”不自欺。一个真正的大儒必得有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的功夫。这和西方的“士”、日本的“士”，只对自己的国王与将军负责，有很大的区别。正是由于有这么一批“士”的存在，中国封建社会才可能是超稳定的，因为这个阶层一直协调其中。人们如果不带有偏见，都无法不承认以下事实：春秋战国时代，诸侯对天子的挑战与蔑视，秦末陈涉“将相宁有种，男儿当自强”的观念，刘邦作为一个地痞登上帝位，王莽敢于篡位，刘秀敢于夺权，南北朝的列国纷争与当时魏晋文化大解放不是两件事，本质上是一致的，最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集东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人物



武则天。如果从文化上讲，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贾谊、刘彻、魏晋文人群体直至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都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。从思想界来说，鸠摩罗什、慧思、昙鸾、道绰、慧能、善导更是把这一文化推到了顶峰，一直到理学完全占了统治地位后，还出了宋代的苏东坡，明代的王阳明，清代的曹雪芹…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。

其实这四条，是一切人本主义社会必备的四条。西方社会虽然对此并不自觉，但今日的西方社会仍包含了这四条因素。从“生命观”的角度说，西方现代社会与古老的东方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，都是对“人”的最充分肯定。就“肉体人”来说，西方文化对“人”的肯定，比我们更彻底一些，一切属于“人”的，精神与物质，社会性与个体性，西方文化作了全面的肯定。这并不是西方文化自己决定的，而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规律。

生命的本质力量，作为与宇宙同行同在同生同灭的生命的本质力量，能量是无限的，但他必须以具体的个体生命体为载体，在宇宙间最有资格做他的载体的，便是“人”。生命的本质力量，作为能量无限、智慧无限的生命，要充分展示自己，必须首先肯定人，高扬人。肯定人，高扬人，就是肯定和高扬生命本身，只有当这种肯定与高扬使人类不堪重负时，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才会进一步显现。

新千年，正是这个时代到来的时代。

十一

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弱点，在这方面有分量的论述太多了。历史本身无对无错，该怎么走就得怎么走，后人去论它的对错，如果不是游戏，也是笑话。

我们不希望在文化圈子中一味地纠缠，文化说到底只是“明德”不断扩展，“生命观”不断进步的表象。“明德”的不断扩展，“生命观”的不断进步，最根本的表现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社会实践中，尤其是经济的发展，科学的进步。

说起人类第一次“文艺复兴”，以古希腊文化为标的西方“文艺复兴”，并不单纯是西方人的事，几乎是同一个时代，中国人也展开了自己的“文艺复兴”，这便是中国的晚明时代，中国的汤显祖未必逊于莎士比亚，《金瓶梅》也不比《十日谈》差，《西游记》与《唐·吉珂德》可以说是绝世双璧。熟悉法国小说《吉尔布拉斯》的人，不难发现其篇章结构与《水浒》的回目勾连极为类似。更重要的是，王阳明的“心学”的崛起，说明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比



西方的“文艺复兴”有着更加博大精深的哲学底蕴。不然，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启蒙时，也不会是那样看重“阳明学”。

但是，中国的这一次“文艺复兴”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“复兴”只是文人圈子中的笔墨游戏，最后夭折于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。女真民族作为一个原始部族，只能把“朱学”捧为官方哲学。“康乾盛世”根本不能和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相比拟，一个是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体现到了极致的时代，一个则成了阻碍中国文化踏步进入现代的迷魂阵。

正如天空中的云层，东方的风太大，那这场春雨就必然要到西方去下了。

十二

当西方文化对“人”这个有机生命体的存在方式作了最充分的肯定之后，人类终于将进入一个新的“生命观”时代了。也就是说，当西方文明（不单是政治，关键是科学技术及整个生产力的发展）把“人”这个有机体肯定、呵护到极致时，那它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。

生命科学是从属医学的需要发展起来的。医学，尤其是当代医学对“人”这个有机体的呵护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正是由于此，便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，从遗传学到生命科学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，直至再造生命体。

信息科学亦是如此，一开始，这门科学莫过是延长人的眼、耳，但现在由于半导体的广泛运用，数码科技的进步，已有消息传来，人脑与电脑联网将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
这一切科技成果的出现，又是与“地球村”的出现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紧密相关的。正是这种形势导致了人类心量的无量扩大。当西方现代派哲学家哀叹人莫过是上帝在地球上弃下的一粒砂子时，他们忘了，他们是站在宇宙的顶端思考宇宙与生命的问题的。他们的哀叹，正是他们心量的扩大。

广大与深邃在这里成了一体。当人类把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切功劳只归为人类自己时，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扩大自己的光芒，这功劳并不是人的，但也是不外乎于人的。当你明白了时，这生命的本质力量就是你自己，当你不明白时，这生命的本质力量就是外在于你的“神”。

东方文化没有什么学说理论，只有希望人类真正认得自己，你就是神，你就是仙，你就是佛；外乎于你，再无神，再无仙，再无佛。人类只是由于视野的窄狭，自信的丧失，才把自己的心胸局限于自己的载体——这个有机的生命体上。这个误会是有史以来文明进步的依赖，但也是文明的最大的悲哀。

我们不是自然科学家，只能从新闻中得知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概



况，但愿这些新闻不是愚人节的新闻。这些新闻的可信度，我们不必做太多的关心，但有两个特点无疑是可以肯定的。

第一，生命科学的进步，无疑是在向人类现有的“生死观”挑战。如果我们估计得不错的话。在时下的世界里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决计会有一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金钱，享受自我生命体的再造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也许会有更多的人会求助于生命再造技术。我们不去神化这种技术进步，认为他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能利用生命再造技术，为“自己”谋利的人终不会是很多的。但是，这个技术在人们“文化——心理”结构上的影响，即对儒家所说的“大学”的影响，是不可估量的，一句话，他将彻底动摇今天人类的以人为本的“生命观”、“生死观”。

人类的“生死观”一旦动摇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，全力以赴围绕人这个有机生命体构筑的整个文明，能不动摇吗？爱情、生育、战争、政治、经济……一系列的价值观念能不动摇吗？

第二，信息科学的发展，必然导致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。我不认为今天网络信息科学的硬软件技术已经走到头了。估计在一个不久的将来，网络信息科学的硬软件技术，还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。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，网络信息技术会像今日的汽车、火车这么普及。最后，网络信息技术会像空气与水一样，人类须臾不可离也。如果到了那样的时候，我们人类不需要电脑与人脑直接联网，也不需要什么记忆的移植，生命便完成了从有机化到无机化的转移。生命可以以有机的方式存在，也可以以无机的方式存在，也可以是以介于有机无机之间的方式存在。悟透了这一点不容易，但只要彻底想一想，你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。

如果有一天，在人类的生活中，网络技术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，你细细想想，你的大脑的一切认识、判断，都必须依赖电脑网络，你每作出一个判断，又必须输入网络，以令其变为社会行为。请问到了那样一个时代，是人脑左右电脑，还是电脑左右人脑？从实践的角度说，人脑与电脑哪一个作用更大？二者的作用能分得开来吗？

人，只有当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世界大网络的一个“终端”，你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人，你的心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心。社会心——即佛学所谓的“众生心”，亦即是儒家所说的“天心”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。而这时，你才能真正理解，你的大脑、你的心就是宇宙运行的一面镜子，一个仪表，一个会自动作出决定、判断的镜子与仪表，是宇宙大网络的一个“终端”，是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的一个终端。“宇宙——生命”系统整



体就是一枚“透明”的帝网之珠。

人类明白了这一切之后，其“文化——心理”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难道还是如今天这样的文化心态吗？所以我们说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时代到来了。

我们说了这么多，事实上是说了一句话，东方文化的大复兴，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自觉不自觉，人类的意识终会回应古老的东方文化，哪怕这个回应不提释迦牟尼、老子、孔子的大名，仍然还是对东方文化的大回应。

但是，意愿明确终比意愿不明确的好，自觉终比不自觉的好。

十七、十八世纪，当中国清王朝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虚荣中时，西方的人文主义已是大张旗帜；到了十九世纪，西方的大炮、毛瑟枪、铁舰，就打到了我们的屁股上了，谁不往前走，谁就灭亡。在炮火中饱尝落后之苦的东方，不得不奋起直追，这才有了二十世纪，革命的百年、奋斗的百年、挣扎的百年。就在我们刚刚追上人家的脚印时，整个世界又要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，我们还能再落后吗？我们还能再挨打吗？

有的人说，我们要赶上欧美还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一百年。我们说你错了。如果对比一下原来古代中国的政治、经济，比西方发达得太多了。那时的西方人做梦也没有想，他们会超过繁荣的东方，只是由于他们在“生命观”问题上有了突破，不日之功，便走到了东方的前面。

我们今日为什么呼吁东方文化的回归呢？

这主要是考虑到高科技发展对社会文化的两面性影响。高科技的发展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，使人类进入新的“生命观”，但也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，如伦理的混乱，道德的混乱等等，这些负面影响都不是现行的道德、法律自身可以解决的，人类将防不胜防。西方人一时半会还很难从“肉身迷信”中醒悟过来。对于他们，高科技极可能造成巨大的道德伦理灾难。而东方人则不一样，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、老子、庄子已经悟透了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，自唐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半把悟透生命本质力量作为一种时尚。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，如果我们继承了这批遗产，使这批精神遗产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，中国人就不用担心如西方那样可能出现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能迅速超过西方人。人们不记得历史的教训吗？前五百年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中国人不接受这个变化，死守自己的“道德迷信”，结果是使中国落后了好几个世纪。至今我们还在吞食这个苦果。如果西方人不及时从“肉身迷信”中走出，他们也会重蹈东方的覆辙。

我们当然不希望西方人重蹈东方人的覆辙，但这恐怕是很难以人们自己的



主观愿望为转移的，我们东方人则完全可以避免这条弯路。

这一次人类“生命观”的突破远不是“文艺复兴”和“启蒙主义”时代可以比拟的。这一次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突破，其速度也不是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，它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加速度发展。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，我们还得落后。

但是，“生命观”问题一旦有了突破，它所产生的物质力量，是无法估量的，不会亚于从TNT武器到核武器的飞跃。

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時候，提出重温东方文化的问题的。

我们学习孔子，一定要吸取这两千年来中国人学孔子所走过的弯路和教训。

孔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铁定的准则，孔子以他一生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的只有两条，一是认清生命的本质力量，并及时关注“生命观”的客观发展的行踪，站在生命观发展的最前列。就今天的人类来说，就是要关心今日世界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的发展变化，透过这些外在的变化，发现“生命本质力量”在背后是如何起作用的，及时跟上“生命本质力量”的变化。

这一切对于个体人未必有什么明显的作用，而对于一个民族，尤其是一个庞大的民族，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

毛泽东道：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

历史已经把生命的山花，推到了烂漫之时，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，了解不了解，看见没看见，东方文化的三大圣哲都会在山花烂漫中舒心地笑着。

孩子们的心总是最敏感的。人们还记得2000年元旦，在崔永元主持的“实话实说”节目中，一群孩子畅想未来的情形吗？一个男孩说他将克隆一个“自己”，让那个“自己”去做作业，而真正的自己则去踢足球……另外一个女孩则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将不住在地球上，都住到别的星球上去，地球则是全人类的度假村……这是幻想吗？不是，肯定是未来的现实。面对这个现实，人类的生命观念，以及由这种生命观念所左右的人的“生死观”、“爱情观”、“生育观”等等文化观念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

只要我们想得稍微远一点，人类文化观念大变革的时代肯定是到来了。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人类的第二次“文艺复兴”，是因为它必然是以古老的东方文化为标的，也就是说它与人类的第一次“文艺复兴”相区别的是：一个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标的，一个是以古东方文化为标的，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大变革，哪个民族落后了，就比第一次的落后更难赶上去。

中华民族不能再落后了！

了解生命的本质力量，即孔子所说的“明明德”，是本书贯穿始终的红线。



但什么是“明明德”？明了“明德”之后，人的现实心态又会是怎样的？这是人们极关心的一件大事。为了让大家都明白什么是“明明德”，我们附录了董遁的《生命与未来》，也许会对人们有所提示和启迪。也使读我们这本书的人，不至于始终搞不清我们在主张什么，讲什么。